



杭州佛学院书系

齐韶花
—
著

商奄考

SHANG YAN KAO

本书求证并最后得出结论：一、商王在最后一都发阳时，曾定都位于今天商丘西南部的「奄」。二、商代的奄奄集团，并不驻居在今天山东省曲阜附近，而是活跃在今天河南省东南角的一支强大的地方军事势力。史载曲阜附近的「微」，正是周王「戮奄」之后，或进射入鲁，或「分奄」入鲁的奄奄集团存在的明证。三、甲骨文所提的「沚方」，并不是之前学者们所考证的处于商代的西境，而是处于商代的东土边境。



浙江
ZHEJIANG

齐韶花
—
著

商 考

SHANG YAN KAO



浙江
大学
出版
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奄考/齐韶花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308-14421-6

I. ①商… II. ①齐… III. ①考古—研究—中
国—商代 IV. ①K87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7883 号

商奄考

齐韶花 著

责任编辑 胡 畔 (llpp_lp@163.com)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彩 插 8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421-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南有樛木——梁宋地南端的中商考古	(8)
第一节 对梁宋地南端至皖北淮河沿线出土的中商青 铜器的统计	(8)
第二节 对梁宋地南端中商青铜礼器的探讨	(12)
之一:中商过渡期是近淮地区商代青铜文化发展的 高潮	(12)
之二:近淮铜器与妇好墓铜器的比较	(16)
之三:近淮铜器与小屯四墓铜器的比较	(20)
之四:近淮铜器与殷墟 I 期铜器的比较	(23)
之五:阜南铜器的范上刻花工艺	(26)
之六:对近淮铜器与殷墟文化关系的讨论	(33)
之七:回眸阜南龙虎尊	(35)
第三节 对梁宋地南端中商遗址的探讨	(39)
第四节 商代梁宋地南端存在铜料来源的可能性	(51)
小结	(61)
第二章 我来自东——考证殷墟卜辞中的“沚方”与文献 所载“商奄”间的关系	(63)
第一节 对本书“商代淮夷”与“淮夷区域”的预定义	(63)

第二节 论证殷墟卜辞中的沚地位于淮夷近邻的确定性	(68)
之一:正人方途中的地名“沚”	(68)
之二:人方处于“淮夷区域”	(71)
之三:沚地位于淮夷以北	(76)
第三节 甲骨文“𠩺”、“古”作“奄”训在文字学上的	
推敲与求证	(77)
之一:初探以“奄”字为字根的甲骨文字	(77)
之二:再问金文“害、害”与隶定文字“奄”之间的桥接	(84)
之三:综观文字从“𠩺”到“奄”的发展	(97)
第四节 奄都与南亳	(100)
第五节 对卜辞地名“奄”及商末“东土”概念的探讨	(107)
之一:对卜辞地名“奄”的探讨	(107)
之二:对商代“东土”概念的探讨	(109)
之三:奄地与“周公奔楚”	(113)
之四:东土之疆的“南音”	(116)
之五:重提“大东小东说”	(117)
第六节 探析卜辞沚方与奄族的关系	(119)
之一:卜辞之“多奄”	(119)
之二:夔尾扁足鼎	(121)
之三:梳理沚方和多奄的关系	(122)
之四:商奄集团	(124)
第七节 略谈沚方殷西位置判断中的误区	(125)

小结.....	(128)
第三章 雄雉于飞——若干有关商奄支族与余部的思考	
.....	(130)
第一节 颍水之滨的胡国与商奄.....	(130)
第二节 江淮之间的群舒与商奄.....	(135)
第三节 商奄与淮夷的关系.....	(139)
之一:穆王铭文中出现的“胡”	(139)
之二:穆王铭文中出现的“古”	(140)
之三:奄在淮夷之北	(142)
小结.....	(143)
第四章 之子于归——结题	(147)
第一节 结论和推论.....	(147)
之一:对商奄都地理位置的判断	(147)
之二:对商代商奄集团地盘的判断	(150)
之三:对商奄史的推测	(152)
第二节 两大思考.....	(157)
之一:对“东夏”说法合理性的分析	(157)
之二:对商奄集团社会组织方式的思考	(159)
第三节 值得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160)
附 录	(167)
附表.....	(167)
地图.....	(189)
示意图.....	(193)
文字资料.....	(196)

甲骨文	(196)
金文	(208)
简文	(213)
参考文献	(215)
索引	(231)
后记	(235)
附图	(237)

前 言

写作本书的最初动机,来自对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的阅读: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处可能的矛盾——陈梦家将武丁卜辞中的沚方,定在武丁的晋南诸国之中,而乙辛时代正人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沚”,按照陈梦家的推测,却应处于今天商丘以南的某地。^{〔1〕}事实证明,陈梦家这个关于武丁时代沚方方位的结论非常重要,因为学术界随后所作的涉及商沚方的探讨时,学者们就都基本以沚方位于商西这个地理位置为出发。^{〔2〕}那么武丁时代位于商西的沚方与乙辛时代位于商南的地名“沚”之间,仅仅是地名使用过程中偶然的“撞辞”现象吗?

问题一:卜辞中的沚方位于河南商丘近地吗?

武丁卜辞中的沚方,无疑对商武丁非常重要,以至于它在 David Keightley 设计计算的,为衡量各城邑与商王间关系的“等级分数”中可以高居第二,^{〔3〕}而在关于它的君主𠂤的讨论^{〔4〕}中,于省吾推断他是传说中的武丁的良相——傅说,林沅则根据他对甲骨文“比”字的解读,认为这个由君主𠂤带领下的沚方,更可能是商

〔1〕 陈梦家,2008:296—297,307—308.

〔2〕 如谭其骧,1982:11—12;岛邦男,2006:857;Keightley, D., 1983: 539;韩江苏,2003:8.

〔3〕 Keightley, D., 1983:539,542.

〔4〕 于省吾,1996:2385—2391.

武丁时期商人的联盟方国，^{〔5〕}张光直也认为他是武丁时期的武官。^{〔6〕}恰恰是在对沚君𠄎的讨论过程中，我读到了唐兰对字𠄎的解读。

唐兰认为卜辞中习见的字𠄎，当从其字构𠄎读，并疑惑卜辞中的部分例句，其中的字𠄎当以“奄”读之。^{〔7〕}而这个可能被读作“奄”的甲骨文𠄎，在殷墟卜辞中，一、不但出现在乙辛时代正人方途经的地名当中，且它还是属于正人方来回程均经过的，离开𠄎较近的一处地方；^{〔8〕}二、在武丁卜辞中，它还是组成沚君私名𠄎的重要部分。

唐兰的这个解读，似一架桥梁，最终帮助我将商代的沚方与文献记载的商奄集团连接起来。

问题二：卜辞中的沚方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商奄势力吗？

武王克商后，周对商人的彻底改造完成，发生在“周践奄”事件之后。其中可见，所谓“奄”势力对殷王朝的力挺。《左传》借赵孟之口道出“周有徐奄”（《左传·昭公元年》）^{〔9〕}——列奄为周的反国，周终而灭奄的史实，算得上是后人对周、奄恶化关系的权威诠释。出土于山东临沂西汉前期墓^{〔10〕}中的《孙臧兵法》，则再次确认了这一说法（见附录：文字资料——简文“银雀山汉简”之标识

〔5〕 又见林沄，1981。

〔6〕 张光直，2002：182。

〔7〕 唐兰，1939：51—52，第64—65片骨。

〔8〕 陈梦家，2008：302，304，306。

〔9〕 阮元，1979：2021。

〔10〕 吴九龙，毕宝启，1974。此简下限应可以确定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处)。^{〔11〕}若以商没后奄尚表现出的,对商武庚的追捧论,则这支奄君一族,至晚在殷末时期,也必与商王维系着良好的,类似君臣辅弼的关系。而古本《竹书纪年·殷纪》载,商王在止于殷的前一站,即以“奄”为都。^{〔12〕}也就是,此处后来反周挺商的奄势力,对商王的追随关系,极有可能还是早在殷墟文化之前就存在的了。那么,究竟该如何解读这支看上去对商王忠贞不贰的商奄集团或奄君一族与商王之间的关系呢?

今天,很多学者谈到对古奄国或商奄都的位置判断时,都喜以《说文解字》段注中所提到的山东曲阜附近的奄城为选。^{〔13〕}因此,有必要仔细阅读《说文解字》这段对“邾”的解字和段注的内容。^{〔14〕}

《说文》邑部“邾”:周公所诛邾国,在鲁。从邑奄声。

段注:《玉篇》作周公所诛叛国商奄,是也。

奄,邾二字,周时并行,今则奄行而邾废矣。单呼曰“奄”,叠呼曰“商奄”。

《书序》、《孟子》、《左传》皆云“奄”,如“践奄”,“归自奄”,“伐奄”,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传》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是也。

[《说文》]大部曰:“奄,覆也。”《尔雅》:“弁,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蓋。”《韩非子》曰:“周公旦将攻商蓋,辛公申曰,‘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

〔11〕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1985:42,第256号简,复印件见附录:文字资料——简文之“银雀山汉简”。

〔12〕 方诗铭,王修龄,2005:29—30。

〔13〕 如顾颉刚,1988:3;何光岳,1995:106—107;张国硕,2003:46—47。

〔14〕 段玉裁,2007:296—297。

奄在淮北，近鲁，故许云“在鲁”。郑注《书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祝蛇说因商奄之民封鲁者，杜云或迸散在鲁是也。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县城东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国，即《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证迸散在鲁之说。

《豳风》：“四国是皇。”毛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商谓武庚。此传，商、奄为二。

段玉裁对“奄”的考证不可不谓详尽，秦汉前文献之有关“商奄”或“奄”的记载，事实上已尽收此注之中！本书因此无须赘文。再加上出土文献《银雀山汉简》对周公灭“商奄”的记载，则，汉前文献中曾散落着若干关于“商奄”^{〔15〕}势力的记载，应无可怀疑。但我认为，段注显然无意于“古奄国在鲁地曲阜”的说法，而实在是强调：1. 鲁地之奄民，系迸散在鲁者；2. 商代的奄在淮夷之旁，而非许慎所云的“在鲁”。

则这个“淮夷之旁”或“淮夷之地”^{〔16〕}的“商奄”又究竟位居何处呢？它与卜辞中的沚君，并可能位于淮夷之旁的地名“沚”究竟是否有关联呢？

〔15〕 为统一说法，本书自此起即以“商奄”称呼这一文献中时而作“奄”时而作“商奄”称的商代势力。另，文献中“商奄即商盖”之“盖”的写法，很不统一，譬如段玉裁、墨子、唐兰用“商盖”，韩非子、陈梦家用“商盖”等。为统一行文，本书自此起采用“盖”写，不再另加说明。

〔16〕 段注所引《多方》郑注为“淮夷之旁”，与今《十三经》中的郑注“淮夷之地”有异。对此，同乡本家齐召南称，“淮夷之地”一说乃笔讹（阮元，1979:233，《尚书·周书·多方》之补注，段玉裁与齐召南的统一，反映了清儒此处较为一致的治经之道）。但郑玄“淮夷之地”的说法也被孔颖达所引用（阮元，尚书·周书·蒲姑，1979:227），孔颖达疏曰：“……郑云：‘奄盖在淮夷之地’。”故此，我认为，郑玄的“淮夷之地”，还不得被忽视。

问题三：商代的奄地(乃至奄都)位于淮夷旁边的商丘近地吗？

如果同时对以上所提的三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则容易得出以下的结论：殷墟卜辞中的沚方，正是文献记载的商奄势力，它在商时的位置，处于河南东南部的商丘一带，与淮夷比邻而居。

本书最初的动机，在于正面论证这个假设下的结论，求证它的成立与否。

审视这个假设下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其中的症结，集中在河南东南部，尤其是近淮地区的商代考古问题中。鉴于我们要考察的这个范围，属于《史记》所言“梁宋地”^{〔17〕}的南端位置，故而本书自此起即以“梁宋地南端”的称谓简而称之；又鉴于有关商奄的文献记载，早自盘庚迁殷前起，故而，对这段商代考古的考察，也就最宜以中商末期为开端、为重点了。

本书采用的对商代中心文化的分期方法，详见附表表2。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首先，本书以可以确定的商中心文化类型为轮廓，将商中心文化分为三段：即早商时期的二里岗文化，中商时期的过渡期文化和晚商时期的殷墟文化。三段中无论当时商文化的表现是否一体化，或已有了多种地方因素的掺和和引入，就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也只有商人的王畿文化^{〔18〕}，才在其中得到了最连贯和持续的发展。本书因此并不急于区分或对立商文化中的王畿文化与地方型文化，而旨在强调，前者在文化发展中所能表现的连贯性和对已确

〔17〕 司马迁，2007：3266，《货殖列传》：“夫自鸿沟以东，芒，碭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

〔18〕 商王畿文化：商王作为都邑时，在都邑及其近郊所遗留下的商文化，譬如考古已揭露的偃师商代遗址、殷墟文化遗址等。在商一代，理应包括考古尚未明了的，而文献有所载的另外几个都邑：相、庇、奄、南亳等的王畿文化遗留。

定的王畿文化特征的继承性。

其次,虽然商人^{〔19〕}的早商王畿文化与晚商王畿文化分别落在商中心文化中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中已无可争议,本书所要涉及的王畿文化之一,落在了 Thorp 定义的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间的过渡期文化^{〔20〕}之中,也应无可争议,但一来学术界对中商文化的讨论尚未尘埃落定,二来如前所述,本书考察的重点,在于商中心文化类型中某一最能衔接晚商殷墟文化的中商末期文化,因此,本书采取将过渡期的商中心文化只分作“中商末期”和“中商末期前”二段的方法,同时参考学术界对中商文化的分期断代和对中商文化类别^{〔21〕}的判断,将本书过渡期商中心文化中的“中商末期”定义如下:1. 处于中商文化中的末段;2. 有典型的、数量不菲的商青铜礼器的出现;3. 作为其中的王畿文化,则在二者之外,更额外地强调这些青铜礼器所反映出的青铜文化具有上贯二里岗文化下接殷墟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它与殷墟文化间的一脉相承性。

第三,随着学术界对安阳范围文化遗存包括铜器类型认识的

〔19〕 商人:商王及其宗族以至于后裔(并其商王朝时期辖下的治民)。商王宗族,包括“子”姓王族,Karlgren 深入研究过的“析子孙”或“举”族、加“亚”型族等,以及文字学家在殷墟卜辞中能确定下来的其他商王族等。这些商宗族的后裔,包括文献记载的宋国的国君与贵族,考古发现的,商亡后的以上商族族铭的器物主人等,不排除有散落于春秋卫国子民中的可能。与之相对的夏王及其宗族以至于后裔辖下的治民,应可称为“夏人”。但由于有夏一代的历史,考古与文献俱未可以详解,故,“夏人”一说,在有商一代,混淆入“商人”或其“方国之人”的可能性兼而有之。本书对此不预加特别区分,也不另作特别定义。

〔20〕 Thorp, Robert. L., 1985.

〔21〕 参考唐际根, 2008: 128—157; 王震中, 2006.

深入,尤其是1999年洹北商城的揭露和此后引发的讨论等,^[22]对“殷墟文化”这一概念作更明确的定义,则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本书接受了王震中的意见,将“殷墟文化”定义为自商王最后一次驻城安阳(即洹北商城城墙始建起^[23]),自此更不徙都(但不包括可能发生在安阳内部由洹北至洹南的某次迁移)发展而来的晚商王畿文化。结合安阳地区商代考古的数据,这个定义下的商代安阳文化,显然地被分成了两段:上段洹北花园庄早期遗存属“中商末期”,也就是本书所增加的“中商末期安阳早段”;下段洹北花园庄晚期的遗存才开始属于晚商殷墟文化的内容。^[24]而这个新定义的“中商末期安阳早段”的时间,在断代上显然已包括了学术界曾经使用的“殷墟Ⅰ早段”^[25]的内容,因此与之相对,本书定义的殷墟Ⅰ——殷墟文化在到达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前的准备期,就包括了学术界曾经使用的殷墟Ⅰ晚段而剔除了原来的殷墟Ⅰ早段的内容了。又由于本书考察的重点介于中商末期与晚商早期之间,故而本书对晚商殷墟文化的分期,自殷墟Ⅱ后不再细分,而只将其统一地称为“殷墟Ⅱ后”。

[22] 唐际根,2008:160—177,洹北商城的发现与初步勘查,178—186,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胡洪琼,2009。

[23] 岳洪彬,何毓灵,2004。

[24] 王震中,2006。

[25] 有关殷墟Ⅰ早段与殷墟Ⅰ晚段的讨论,见唐际根,2008:71—85。曾经使用的“殷墟Ⅰ早段”的概念见郑振香,2003,其中包括本书讨论的小屯四墓,三家庄墓葬80ASJM1, M3和M4。

第一章 南有樛木——梁宋地南端的中商考古

第一节 对梁宋地南端至皖北淮河沿线 出土的中商青铜器的统计

海洋学家们通过对现代黄河三角洲的粒度特征和渤海西岸贝壳堤的物质成分分析,认为在距今 7000 年至公元 1128 年,正是由于黄河特别高的含沙量和输沙量,黄河分流河道和下游河道的双重摆动,黄河出口处才有了足够数量的沉积物堆积,才导致了科学家眼中的渤海和黄海西岸 10 个超级叶瓣(三角洲)和叶瓣(三角洲)的形成和双重迁移。而且这个时间段的黄河下游,一如今天,是经由山东注入渤海的。〔26〕

观察黄河在今天河南段的走势(见附录:图 45):约过今天的河南郑州市后进入广阔的平原地带,在河南封丘与兰考间突然折而向北。自此段的黄河河道至南部的淮水之间,不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低倾,且中间河道密布,分布着如惠济河、包河、浚河、沱河、汴河、涡河、颍河、茨河、西淝河等的淮河支流,并经由它们,将豫东地区与皖北的淮北平原连成紧密的一片。可以想象,如若黄河此段(或并稍前段)的分流河道摆动严重,则势必造成对黄河折而向北处和对它南部位于低洼地段的淮河水系的压力,进而很容易在我们讨论中的梁宋地区〔27〕形成水难。

〔26〕 薛春汀,周永青,朱雄华,2004.

〔27〕 见脚注〔17〕。

事实正是如此。梁宋之间不但是史载著名的黄泛区,且,以下所列地质勘测的数据和考古成果无一不展示着,以上陈述的可靠性:

1. 在柘城孟庄商代遗址中,钻探出遗址的北缘有古河道,遗址南端约 120 米以内也有游沙,其下才有商代的文化堆积。^{〔28〕}我们知道,柘城孟庄商代遗址的断代是中商白家庄期后殷墟 I 前,也就是,最早在殷墟 I 前后,这里曾因洪水泛滥被淹没过。

2. 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以南的戴张庄和刘官庄一线,探测出这里在历史早期应有大的古河道,并进而推测它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载的睢水,曾是黄河多股入淮时“分流泛道”中重要的一支。^{〔29〕}

3. 中美联合考古队对商丘地区^{〔30〕}长达 6 年的地质考古调查,发现古河道北侧老南关一带至少堆积了 8—11 米的黄泛沉积物,商丘地区南部则堆积了 4—6 米的黄泛沉积物。进一步的分析和检测让地质考古者相信:黄河自北宋末年起的开始抢淮入海的多半段时间(约 400 余年)里,是通过诸多的“分流泛道”而汇入淮河的。仅在此后直至黄河重新北流入海的时间(明嘉靖至清咸丰约 300 年)里,黄河水才开始通过单股河道而汇淮入海,从而留下了我们今天在商丘北部仍可以看到的,高出两侧平原 5—10 米的所谓“明清故道”。而此前未抢淮入海的黄河虽北流入海,但据地质考古学家的观察,商丘地区仅在晚更新世至汉代前后,也就是深埋文化层中的最底部,地层的形成原因才是以成壤作用(非后来的沉积作用)为主体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商丘地区唯在汉之前,洪水泛滥罕见,之后形成的“黄泛”地貌却极有可能“掩埋或部分掩埋

〔28〕 胡谦盈,1982:49.

〔29〕 高天麟,慕容捷,荆志淳,牛世山,1998:25.

〔30〕 主要集中在商丘城西、南、东南约方圆六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了早期形成的文化遗址”。^{〔31〕}

而表 6 的遗址统计(尽管因这个地区考古调查的困难使得数据不全)已证明中商时期的梁宋地南端,至少在一些入淮支流的沿岸垆堆上(实际上更可能在这些入淮支流的平谷地带),已星罗棋布地散布着或大或小的商代民居或村落,同时商人在中商末期时的影响已到达梁宋地南端的推断也应得到肯定;根据在商丘坞墙、柘城孟庄、夏邑清凉山、鹿邑栾台等地的商代遗址考古(见图 45)发现,商人殷墟 I 甚至之前的典型长方体鬲已然出现在了这些地区(见表 6 中的说明备注栏,例见图 41:6)。

考古工作者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也显示,皖北淮北地区,在“茨河、武家河、赵王河沿岸,有殷商文化的遗存”,尤其是“太和县六十里倪邱集之茨河河湾,包含着极丰富的文化遗存”,并“遗物有小屯殷代遗物的作风”。^{〔32〕}茨河属于淮水北支水系,其下游南岸的太和县则地处豫东与皖北的交界地段(位于界首与阜阳之间),故而尹焕章强调,“南到太和县的茨河区域,与豫东的商丘,永城,鹿邑的殷代遗址,是有密切关系的”^{〔33〕}。虽然这些报告中涉及的豫东与皖北地区的“殷商遗存”,有待我们在后文第三节与第四节中再议,我们也无法从这些报告中判断出中商文化在皖北的分布与发展,但,豫东与皖北的茨河区域,在殷墟文化前后的时间段里,有着一体或几乎同步的文化发展,则可以从中得到肯定。

此后王迅将皖西北商代遗址分为二里岗上层、殷墟Ⅲ和殷墟Ⅳ的三期划分法,^{〔34〕}似乎补充说明了,漫长的中商过渡期,商中心文化对皖西北地区的影响(粗略而言,即图 45 中以紫线划出的“近

〔31〕 荆志淳, Rapp, Jr., George (Rip), 高天麟, 1997.

〔32〕 殷濂非, 1954; 尹焕章, 1954.

〔33〕 尹焕章, 1954: 29.

〔34〕 王迅, 1994: 31—34.